

走出困扰

——“非典”引发的人文思考

主编 石挺 何金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走出困扰

“问题”

引发的人文思考

主编 石 挺 何金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困扰——“非典”引发的人文思考/石挺, 何金晖 主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0

ISBN 7-5622-2801-9/D·145

I. 走…

II. ①石… ②何…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1703 号

走出困扰

——“非典”引发的人文思考

© 石挺 何金晖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武昌桂子山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1321)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 刘晓嘉

封面设计: 罗明波

责任校对: 张 钟

督 印: 姜勇华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中华民族永远需要崇高——“非典”引发的美学反思	
.....	张玉能 (3)
痛定思痛——关于“非典”的哲学思考	
.....	张三夕 (17)
“非典”流行的地球伦理学思考	
.....	龚胜生 (35)
抗击“非典”与政府的责任伦理	
.....	龙静云 (48)
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	
.....	王玉德 (61)

农民流动、“非典”与公民保障网络	
.....	徐 勇 (75)
论后“非典”时期信息传播理念的建构	
.....	刘九洲 (86)
从“非典”事件反思我国的农民工政策	
.....	江立华 (97)

“非典”时期的个体非理性与集体非理性	蔡志海 (106)
“非典”留给我们的启示：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杨生勇 (117)

三

“非典”流行期间心理援助热线咨询的回顾性分析	江光荣 余晓敏 周宗奎 汪海燕 刘朝莹 (129)
当灾难降临	
——对“非典”时期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社会心理思考	佐 斌 (139)
“非典”事件：高校德育实效性的反思与重建	王建梁 (153)
“非典”疫情下的民众恐慌与心理应对	陈雪玲 (162)

四

从“非典”事件看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姚锐敏 (170)
应当建立社会安全预警机制	丁毅华 (187)
“非典”防治的法制思考	石先钰 (197)
“非典”与中国社会医疗救助	湛 虹 (206)
对完善我国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几点思考	丁 悦 (216)

五

从“非典”疫情看中介组织的作用

——以武汉餐饮业协会为例

.....	姚伟钧	(226)
“非典”引致需求的商品价格行为及其调控		
.....	肖殿荒 刘旺霞	(236)
“非典”对电子商务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	王学东 周 涛	(246)
“非典”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	石丹林 欧阳姝 严丹红	(257)
后记.....		(265)

●这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的具体显现，它铸就了当代中国的崇高之美，它表现了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本质力量，它显现了人类在伟大的生活实践中必将实现自己自由的审美本质，它也证明，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都需要崇高，即使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也不能躲避崇高、游戏人生，而是一定要发挥崇高的审美精神和审美态度，树立起崇高的伟大形象，使得崇高的美（阳刚之美）与优美的美（阴柔之美）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全面而自由地显现人的本质力量，更加有效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张玉能：《中华民族永远需要崇高——“非典”引发的美学反思》

●作为一场巨大的灾难，“非典”从以下几方面提醒人们要充分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其一，“非典”流行时的不确定性突现了人类对疾病认知的有限性，尤其是人面对从未见过的突如其来的大规模传染病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其二，人们对“非典”的无知以及“非典”的死亡率，导致普遍性的恐惧和过度反应，说明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的脆弱性，人对灾难承受能力的有限性。其三，疾病、战争与死亡无时无刻不在见证人的生命的有限性。

——张三夕：《痛定思痛——关于“非典”的哲学思考》

●SARS, AIDS, 以及其他所有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安全的新的传染病，无论它们是与人类协同进化的产物，还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副产品，它们的流行都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伦理要求。它们要求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学的范畴，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

扩展到动物、植物、岩石乃至整个大自然；它们也要求人类承认大自然或生态系统拥有存在的权利和内在的价值，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调节和约束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关系；它们还要求人类承担起对大自然的道义和责任，为地球生态系统里的其他栖息者的权利进行辩护和捍卫，并充当它们的道德代理人。

——龚胜生：《“非典”流行的地球伦理学思考》

●那么，在诸如 SARS 流行这样的事件中，以民为本的政府责任伦理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基本要求又是什么呢？首先，以民为本的政府必须将关心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执政的头等大事来对待。其次，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在面临突发事件时，必须迅速承担起采取应急措施控制事件发生和蔓延的责任。第三，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还必须对政府管理危机的措施所导致的有关社会公众利益受损承担补偿责任。

——龙静云：《抗击“非典”与政府的责任伦理》

●中国古代有详细的疫情记录，有对付疫情的宝贵思想，有一套积极的办法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谈到人类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苦难，瘟疫是折磨人类的一个祸根。他寄希望于大同时代，那时就不会有瘟疫了。但愿康有为在一百多年前做的美梦能够早日实现。

——王玉德：《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

中华民族永远需要崇高

——“非典”引发的美学反思

张玉能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之中，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前赴后继，冒着生命危险冲在了斗争的第一线，我们的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领导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定信心，相信科学，逐步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的具体表现，它说明，中华民族永远需要崇高，不能躲避崇高、游戏人生，要充分理解崇高之美的伟大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一定要从美学上真正理解崇高的含义，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平衡地发展优美（阴柔之美）与崇高（阳刚之美），使中华民族更加繁荣昌盛。

关键词：抗击“非典”；崇高；躲避崇高；实践的自由；准自由

一、为什么做这样的反思

2002年冬2003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灾难降临在神州

大地的部分地区，面对这一时间猖獗肆虐、不明究竟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他们为了抢救被感染的“非典”病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在了最前面。由于对“非典”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和救护车司机等人也被感染了，有的人，像叶欣、邓练贤等同志以身殉职，倒在了抗击“非典”斗争的第一线，还有许多人倒在了病床上，这时候，另一批医生护士又冲了上去。在这场没有炮火硝烟的殊死搏斗中，他们有过心痛，却没有丝毫犹豫，前赴后继地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与此同时，党中央英明决策，带领广大的党政领导干部、党员、人民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定信心，相信科学，逐步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的具体显现，它铸就了当代中国的崇高之美，它表现了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本质力量，它显现了人类在伟大的生活实践中必将实现自己自由的审美本质，它也证明，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都需要崇高，即使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也不能躲避崇高、游戏人生，而是一定要发挥崇高的审美精神和审美态度，树立起崇高的伟大形象，使得崇高的美（阳刚之美）与优美的美（阴柔之美）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全面而自由地显现人的本质力量，更加有效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抗击“非典”的斗争之所以促使我对崇高作了这样的美学反思，除了上述医务工作者和全党、全国人民在疫病妖魔面前确实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矗立起了崇高壮美的光辉形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文艺界和美学界，应和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躲避崇高”、“游戏人生”、消解一切崇高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态度的思潮。这股思潮对于中国十年浩劫的“假、大、空”，对于极左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调侃、有意的解构、有力的批

判，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这种思潮把中华民族的许多美好崇高的东西也一起进行了扫荡，认为游戏人生、物质追求、感性愉悦才是人生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只有躲避崇高，游戏人生，才能实现人的真实目的；不要侈谈什么“崇高”、什么“人文精神”，那些都是虚伪的、矫情的，因此是应该躲避、抛弃、嗤之以鼻的。用这种思潮的观点来审视和考察我们还在进行之中的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以及在这场斗争中出现的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和崇高壮美的光辉的英雄人物，我感到无论如何难以想通其中的一切意义、价值、精神。这场斗争中显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其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无论如何是不能用“躲避崇高”、“游戏人生”、“戏仿”、“反讽”、“平面化”、“消解深度”、“否定宏大叙事”等等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观点、美学理论来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反之，它们恰恰证明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都需要崇高，而且永远需要崇高。因此，我们要从美学理论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

二、崇高的美学范畴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实践—创造的自由之含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实践—创造中人能够把握和运用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来为自己的某种目的，特别是审美的目的服务；即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二是在实践—创造中人能够超越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直接功利关系而主要实现了人的某种非功利目的，尤其是审美目的，即达到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三是在实践—创造中人能够和谐地处理好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达到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当人类这些实现了的实践—创造的自由以感性形象体现出来并形成了肯定性的

价值属性，那就是广义的美，尤其是指狭义的美，即西方美学所谓优美，我们称之为柔美。因此也可以说，柔美是形象所显现的人类已实现的自由的肯定价值。

但是，无论从个体来看还是从群体来看，人的实践一创造是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达到某种自由程度或自由境界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各方面条件不成熟就难以实现自由，但是，人的实践一创造可以通过反馈机制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来调整或预构人与自然、社会（现实）的关系，通过矛盾冲突甚至失败毁灭来显示自己对于自由未来必定实现的信心，这时，人虽然未能在实践一创造中实现自由，然而却朝着自由的正确方向前进，也就是人处于一种准自由状态，即客观地预示和主观地深信自己一定会在将来某一时刻达到实践一创造的某种的自由程度或自由境界。简言之，准自由即在实践中暂时未能实现但终将实现的自由。当某种形象来显现这种实践一创造的准自由时，这个形象的对象就成为了我们所谓的刚美、西方所谓的崇高。这种刚美是一种矛盾冲突的美，激荡振奋的美，与和谐平静、温柔可人的柔美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对应，共同组成肯定价值来显现人的实践一创造的现实自由和潜在自由（自由和准自由）。同样，刚美也可以细致地分为三种形式：壮美、崇高、大美。

壮美主要是以自然现象和事物形象显现人的准自由。也就是说，当一些数量巨大、威力巨大、形式粗犷的自然对象，像崇山峻岭、瀑布湍流、茫茫沙漠、浩瀚大海、猛兽巨兽等，在人的实践之中暂时还未被征服，它们的规律也未能被人掌握，更无法用来实现人的各种目的，然而由于人们实践一创造的长期积累沉淀，人们虽一时无法改造或创造它们，可是人们却处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界的前进历程中，因而可以在初步了解对象本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联想、想象的过程，与它们发生一定的审美关系，这时的自然对象以一种冲突矛盾和运动发展的形象，使人产生一种先

感到威压甚至痛苦而最终深信自己力量必定在未来某一时刻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的特殊快感，它们就在与人发生审美关系之中成为一个具有刚美的对象之一：壮美对象，它们就具有了壮美的审美属性和价值。因此，一般说来，壮美的对象主要是一些未经过人们直接加工改造的巨大而粗犷的对象，像长空、烈日、暴风、急雨、猛兽、疯狗、台风、巨浪、险峰，而且当它们以自己的形象显现出在与人的矛盾冲突中既有震慑人心却又未真正地压倒人的实践和创造时，它们与人发生审美关系而成为壮美对象。同时我们也看到，壮美的审美属性一般是产生于柔美（优美）的价值之后的，往往经过了一个神话、宗教的提炼过程，像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戟、西绪福斯推石上山、普洛米修斯被缚于高加索山巅等神话中的天、日、海、干戟、巨石、山巅就都是生成为壮美对象的过程记载，像原始人们对于各种动物、植物、山水等的图腾崇拜、祭祀膜拜也反映了宗教与审美，圣神和壮美同时生成于人类实践—创造的准自由的历史事实。

崇高主要是以社会事物和现象的形象显现人类实践—创造的准自由的肯定性审美属性。像高高凌驾于每个人头上的家庭、宗族、部落、国家、命运、历史、法律、政治、道德、宗教等现象和事物，当它们成为一种与个人发生冲突而令人感到压抑的力量，然而最终并未使人压垮，人们反倒以自己的实践—创造的已实现自由为基准，反而相信自己征服、改造它们的力量时，这些社会现象和事物就与人发生一种特殊的审美关系，生成出它们的崇高属性和价值。同样，它的生成也伴随着神话、宗教之类的历史过程，女娲、夸父、精卫、刑天、西绪福斯、普洛米修斯等都代表着人们对母系社会、父系社会、政治权力、道德禁忌等的矛盾冲突和驾驭理念，每一种社会组织及其权力都有一个人格化或妖魔化的类人形象，也正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事物和现象由威压感向崇高感的转化过程。上述那些神话也正蕴涵着宗教和审美（艺

术)同步生成于人的实践—创造之中的历史真相,也反映了崇高生成的历史过程。

大美则主要是以人本身的形象或某种人类道德情操的象征形象来显示人类实践—创造的准自由的肯定价值。像女娲、夸父、精卫、刑天、西绪福斯、普洛米修斯等神话人物所显示的艰难创造、不屈不挠、宁死不屈、敢于斗争、坚守信仰等人类的本质力量,通过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以形象显现出来,他们虽败犹荣、屡败屡战、前进不止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合乎人类历史规律和人类生存和发展目的的,是以牺牲自己一己的私利为前提而争取整个群体或社会的更高利益的,因而包含着未来必定实现的自由,潜在的自由,即准自由。中外历史上的一切英雄人物,如屈原、岳飞、文天祥、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苏格拉底、普鲁图斯、丹东、克伦威尔、拜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都以自己的历史形象显现了人类实践—创造的准自由,从而是大美的历史人物。

当刚美(壮美、崇高、大美)的对象在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中被否定,即遭受厄运或者被毁灭之时,悲剧性的典型形式也就生成了。刚美的被否定,由于其刚美内涵的准自由的未来必定实现性,就必然由表层的被否定而跃向深层的否定之否定,从而也就达到对人的实践—创造的自由间接肯定。只有这样,悲剧性才有其存在价值,也才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使人本身得到升华。

三、崇高的特征及其社会价值

从以上所述的崇高(阳刚之美或刚美)的美学范畴来看,在抗击“非典”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们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党政领导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显现出来的崇高主要是一种大美,是一种以人本身的形象或某种人类道德情操的象征形象来显

示人类实践一创造的准自由的肯定价值。它最集中、最鲜明、最具有人类社会特色地体现了崇高（刚美）的特征及其社会价值。

首先，崇高（刚美）的对象一般具有更加巨大的数量、体积，更加粗犷的形式，更加惊心动魄的力量，因而它们更加能够显现人类潜在的本质力量，因而也就更加能够激励人们去实现实践的准自由，凸现出人们对于未来必然实现的实践自由的无比信念。

表现为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的刚美（阳刚之美）——壮美具有更加巨大的体积、数量，更加粗犷的形式，更加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是一目了然的，像喜马拉雅山的顶峰、黄河壶口大瀑布、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等等。表现为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的刚美——崇高的情形稍微复杂一些，它主要以宗教中的上帝、神仙魔怪，政治中的权力象征、帝王将相，道德中的君子、忠臣、良将等等显现出来，它主要以精神性的惊心动魄的力量为主要标志，而并不在物质形态的数量上的巨大。表现为人的本身的大美就更加主要是以人自己的群体的巨大力量和道德情操的惊心动魄的力量为标志。这次我们中华民族面对“非典”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党政领导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质就是这种“大美”。

从群体而言，抗击“非典”斗争中显现出来的“大美”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依靠着这种精神曾经战胜了千难万险，我们曾经以它战胜了各种外族的入侵，克服了各种天灾人祸，像1998年那样的特大洪水；像这次肆虐嗜人的“非典”，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崇高民族精神的抗争之中，变成了被降服的对象。在斗争之中，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和党政领导干部、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夜以继日，前赴后继，一批医生护士倒下了，有更多的医生护士冲了上去，夫妻双双上前线者有之，已经年届退休的老教授主动请缨者有之，有的把危险留给自己而把生

命留给战友和病人，有的为了学生和他人的安全自己却以身殉职……正是这一大批舍生忘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崇高的医务工作者、党政领导干部、党员、群众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抗击“非典”的刚美形象，铸造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

从个体来看，抗击“非典”斗争中显现出来的“大美”就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充满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孟子曾经说过：“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正义·尽心章句下》，《诸子集成》[一]，第585页）这里的“大”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美”，它是一种光彩照人、气贯长虹的崇高的道德品格和伟大精神，是一种为了正义和他人而牺牲自己的浩然正气，它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正义·卫灵公》，《诸子集成》[一]，第337页）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上》，《诸子集成》[一]，第461页）孟子关于“浩然之气”又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正义·公孙丑章句上》，《诸子集成》[一]，第118页）这种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他人的利益而选择自己的危险和死亡，为了正义和仁道、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而从容赴难就死，确确实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正大刚直的崇高伟大的精神。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党政领导干部、党员、群众都表现出了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崇高伟大精神。他们巨大的、惊心动魄的力量就来自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正义之道，人的顶天立地的精神，人的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这种崇高伟大的精神和浩然正气，绝对不是那种以物质利益为惟一目的、以灯红酒绿的享受为人生惟一乐事、以个人的一己私利为惟一价值准则的、躲避

崇高、游戏人生的人们所能具有的。

其次，刚美（崇高）是一种冲突的美，激荡的美，它是在人与自然或社会的冲突中显现出来的人的潜在的实践自由和本质力量，因此，它最充分地表现了人的实践自由和本质力量，最能激起人们的自我实现的内在冲动，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不可或缺的巨大力量。

面对着尚未把握或没有全部把握其规律的对象，人类往往是处在一种摸索、探究的过程之中，因此人与自然或社会就不可能那么和谐，必然表现出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特别是那些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传染疫病，有时会使人们一时手足无措，处于被动受害的境地，如果人类在这些突然的天灾人祸面前束手待毙，那么，人类早就会像恐龙一样在地球上销声匿迹、种族灭绝了。但是，人类自从被大自然的冰川时期的突然全球变冷从树上逼迫到了地上，就一直在以坚强的意志与大自然作殊死的搏斗，一方面改变自己的身体和行为，从树上来到了地上，由四肢爬行变为两只后肢直立行走，不断由从大自然的恩赐中获取生存条件变为以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来创造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不断地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与大自然作艰苦卓绝的斗争，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来为人类的各种目的服务，以达到实践的某种自由。然而这种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必须流汗流血的，并不是平坦的，不过，尽管人类实现实践自由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可是人们并没有被那些艰难险阻、流血牺牲所吓倒，而是一代一代地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正是在这种斗争之中，人类的崇高形象矗立在了宇宙之中，人类的崇高精神使得人们不断战胜各种困难，实现自己的实践自由和准自由，开创美好的生活。德国伟大的诗人、美学家席勒在《论崇高——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1793）中明确地说：“在有客体的表象时，我们的感性本性感觉到自己的限